

富人治村有利于农村减贫吗?

胡 联¹,卢 杨²,沈鹏程³,汪三贵³

(1.安徽财经大学 城乡发展研究院,安徽 蚌埠 233000;2.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3.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富人治村已渐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主流模式,理论界对富人治村的利弊一直存在争议。在我国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的背景下,研究富人治村是否有利于农村减贫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基于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富人治村不利于农村减贫,富人治村会导致建档立卡和扶贫项目的精英俘获,进而影响农村减贫。如果村级治理完善,富人治村可发挥其正面作用,有利于农村减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农村减少贫困。我国须加强对富人村干部的监督、村庄运行要增加监事制度,逐步推行并完善村民议事会制度,健全乡村治理,引导富人村干部真正成为我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建设性力量。研究结论对我国精准扶贫完善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富人治村;农村减贫;精英俘获;村级治理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9X(2019)05-0046-09

一、引 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富人治村在我国沿海和中西部农村地区已渐成为普遍现象。一方面,富人治村在某些农村地区成为不可逆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是重中之重。在这种双重背景下,富人村干部能够实现带领广大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目标吗?富人治村有利于农村减少贫困吗?

一些学者如卢福营^[1]等认为富人治村是我国农村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农民增收的正确道路,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如贺雪峰^[2-5]、刘锐^[6]等认为富人治村使得富人优势进一步加强,富人村干部可以基于自身的意愿影响国家投入的资源的使用,而不是大多数村民的意愿。

从我国反贫困实践显示,富人治村已成为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主流模式的同时,村两委涉农(扶贫)犯罪的案例屡见不鲜。2008 年全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其中村支书达 1 739 人,村主任达 1 111 人。2016 年 6 月最高检披露,一些市县村两委负责人案件占有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50% 以上,有的高达 70%~80%。2017 年 8 月黑龙江纪委通报哈尔滨市曙光村原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福祥案,涉案金额达 2 亿多元。经查 2011 年至 2012 年,于福祥涉嫌挪用公款 8 520 万元。2011 年,于福祥将征地补偿款 1 080 万元

收稿日期:2018-1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融合视阈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优化研究”(18BJY204);教育部规范化基金项目“我国脱贫攻坚决胜阶段中精英俘获的形成机理及对策研究”(19YJAZH031);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富人治村、精英俘获与扶贫项目瞄准偏离”(gxyqZD2018040)。

作者简介:胡联,男,湖南怀化人,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贫困理论。

以“农民新居”建设资金名义从乡农经中心借出,实际用于其个人开办的公司支出。

目前理论界对富人治村的研究大多为基于农村基层民主角度的定性分析,罕见对富人治村与农村减贫的深入分析。本文基于贫困村互助资金调研数据分析了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并借鉴 Galasso 和 Ravallion^[7]、Besley 等^[8]、Pan 和 Christiaensen^[9]、Panda^[10]的研究从精英俘获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富人治村影响农村减贫的内在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研究贡献可以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1)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联合国家扶贫办对全国贫困村互助资金(以下简称“互助资金”)试点村调研所得的数据。研究发现富人治村不利于农村减贫;(2)富人治村不利于农村减贫的内在机理为富人治村会导致建档立卡和扶贫项目的精英俘获,进而影响农村减贫。(3)如果村级治理完善,富人治村可发挥其正面作用,有利于农村减少贫困;但如果村级治理不完善,富人治村可发挥其负面作用,不利于农村减少贫困。加强对富人村干部的监督、村庄运行要增加监事制度、加强乡村治理机制体制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是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精准扶贫完善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都有重要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 制度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先富人当选村干部逐渐成为沿海发达地区的一种新现象。苏南模式解体后,随着当地乡村集体企业的去政治化,同时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江苏等地农村出现了大量富人村干部。比如江苏射阳县就规定村支书或村主任个人资产必须在 10 万元以上。

随着时间推移,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也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据《商界》杂志社 2004 年调查显示,重庆市渝北区玉峰镇 6 个村的村干部中,个人资产在 100 万元以上占 50%以上。革命老区甘肃省庆阳市大力开展“双培双带”工程,富人村干部逐渐增多,卅铺镇 15 个行政村,67%的村支书个人资产在 50 万元以上。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农业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的主要任务从以前的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逐渐转变为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公共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致富能力强”的村干部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21 世纪初,“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双带”方针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方针。因此,富人村干部在全国范围内渐渐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富人治村从局部现象显现出全面扩展的趋势。即便在很多农村贫困地区,富人村干部也很受上级政府的支持,其理由是贫困村脱贫需要富人村干部的引领作用。

随着国家对农村投入的资源逐渐增多,富人当村干部的自身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富人治村在某些农村地区成为不可逆的现象。

(二) 研究假说

对于富人治村,理论界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如仇叶^[11]认为在社会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出现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韩鹏云^[12]认为“富人治村”是乡村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基层政府逻辑导向及村庄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具有部分合理性。另一些学者则对富人治村持否定的态度。欧阳静^[13]指出富人村干部难以在乡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袁松^[14]也认为富人治村会排斥普通村民参与政治,将带来公共资源的损耗。陈柏峰^[15]指出,不同类型的富人治村都削弱了村级民主,不利于基层民主的良性发展。富人村干部通过与“混混”势力的联合,垄断村庄政治经济事务。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村级治理主体在促进扶贫项目瞄准上面临关键挑战。Pan 等^[9]发现坦桑尼亚 60%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被村干部的家庭俘获。Besley^[8]、Panda^[10]认为公共福利项目瞄准受到基层地方政府精英(村干部)俘获严重影响。王谦和王秋芬^[16]认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减贫效应显著且存在区域差异性,总

体上西部边远地区各省市财政支农支出的减贫效应大于东中部地区。

综上所述,很多学者认为富人治村会带来村庄公共资源的损耗,而我国反贫困实践的推进伴随着大量公共资源的传递到贫困村。因此本文提出了研究假说 1:富人治村不利于贫困村贫困减少。

同时,国内外的精英俘获研究为富人治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Laffont 和 Tirole^[17]、Bourdieu^[18]等较早开始了精英俘获的研究。贺雪峰^[4]指出,富人治村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富人村干部可以凭借自己的偏好而不是大多数村民的偏好,来使用国家投入的资源。袁松^[14]指出富人治村导致输入农村的资源在传递中被大量吸食,乡村治理发生了内卷化。刘锐^[6]认为富人村干部一方面维持表面的权力结构稳定,另一方面与精英结成权力的利益之网共同谋利。陈柏峰^[15]认为富人治村不利于基层民主的良性发展。在这些学者看来,富人治村对基层民主带来了破坏性影响。温铁军^[19]认为如果没有农民自上而下、平等广泛参与的基层组织创新,则乡村治理难以摆脱经济领域的“精英俘获”。胡联和汪三贵^[20]发现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国内为精英俘获的理论研究表明村级治理不完善是精英俘获产生的重要原因。当前富人治村在很多地方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结合本文引言中富人村官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事实,因此本文提出了研究假说 2:富人治村会导致扶贫项目精英俘获。

三、研究设计

(一) 识别策略

对于本次调研而言,互助资金试点是一个外生的事件,试点贫困村农户有机会使用互助资金的贷款。非试点贫困村农户没有机会使用互助资金贷款。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本文参考张宗新和杨万成^[21]、简泽等^[22]、Bai 和 Jia^[23]的研究,建立计量模型(1)来评价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的影响。

$$Y_{itv} = \beta_0 + \beta_1 D_t + \beta_2 D_{treat} + \beta_3 D_t D_{treat} + \beta_4 D_t D_{treat} D_{rg} + \beta_5 D_{rg} + \beta_6 D_{treat} D_{rg} + \alpha X_{itv} + \delta_i + \varepsilon_{itv} \quad (1)$$

其中, Y 为农户人均纯收入, i 代表农户, v 代表省份, t 代表年份。 D_{treat} 代表是否是试点农户的虚拟变量,如果该农户是试点农户则为 1,否则为 0。 D_t 代表农户是处于试点前还是试点后的虚拟变量,如果是试点后则为 1,试点前为 0。 δ_i 为省的固定效应, D_{rg} 代表贫困村是否是富人治村的虚拟变量,贫困村是富人治村则为 1,否则为 0。

根据汪三贵等^[24]的研究,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了贫困村劳动力、耕地、基础设施等控制变量,用 X_{itv} 表示。我们关心的是交叉项 $D_t D_{treat} D_{rg}$ 的回归系数 β_4 ,它代表互助资金试点村和互助资金非试点村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富人治村对互助资金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也即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的影响。

(二)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是源自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联合国家扶贫办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4 年对 5 省 20 个非试点村和 30 个互助资金试点村的抽样调查数据。考虑样本代表性,课题组选择了山东、河南、湖南、甘肃和四川 5 个省作为监测评估省。然后在每个县的 5 个备选村中,课题专家组以随机方法在项目组推荐的 2 个县各 5 个备选项目村中各抽取 2 个对照村和 3 个项目村。接着采用分层等距抽样的方法,课题组在对照村和项目村中随机抽取 30 个农户进行问卷调研。调研内容具体包括贫困村人口、耕地等情况、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收入和互助资金的组织运行情况。课题组在 2010 年 8 月进行了基期调研。2014 年 7 月,课题组进行了追踪调研,进一步补充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50 个互助资金试点村农户和村级数据,研究总样本包括 2 632 个农户数据。本文使用数据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主要变量衡量指标如下:富人治村 D_{rg} ,度量指标为贫困村村支书或者村主任的家庭人均收入如果在本村

调研农户收入十等分中最高一等分则为 1,反之为 0;村贫困发生率 *Headcount*,度量指标为贫困村贫困人口数与村总人口数之比;村贫困缺口 *PovertyGap*,度量指标为贫困村贫困人口与贫困线之间的平均距离;农户家庭抚养比 *dp_Ratio*,度量指标为农户家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村到本乡镇政府的距离 *d02*,度量指标为农户去年耕种面积;村民代表大会年开会次数 *h05*,度量指标为贫困村村民代表大会年开会次数;户主文化程度 *hedu*,度量指标为贫困村农户户主上学情况。主要变量数据统计性描述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数据基本特征

变量名称	标签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户人均纯收入	<i>pinc</i>	2632	3202.47	2608.22	-282	10006
富人治村	<i>D_{rg}</i>	100	0.59	0.49	0	1
家庭人口抚养比	<i>dp_Ratio</i>	2632	0.56	0.52	0	5
家庭人口数	<i>pop</i>	2632	4.24	1.60	1	13
家庭是否通电	<i>b04</i>	2632	0.83	0.53	0	1
平均受教育程度	<i>aedu</i>	2632	6.10	2.74	0	15
户主文化程度	<i>hedu</i>	2632	6.69	3.97	0	17
家庭挣工资人数	<i>gongzinum</i>	2632	1.08	0.99	0	6
年耕种面积	<i>d02</i>	100	5.68	6.87	0	107
去年开过多少次村民代表大会	<i>h05</i>	100	6.44	4.26	0	24
家庭人均外出务工年数	<i>amyear</i>	1313	1.97	2.77	0	10
村贫困发生率	<i>Headcount</i>	100	34.72	14.86	3	82
村贫困缺口	<i>PovertyGap</i>	100	17.33	10.66	2	58
农户家庭人均消费	<i>pexp</i>	2632	1413.64	1314.33	205	5156
农户是否有需要借钱但借不到的情况	<i>j18</i>	1316	0.10	0.30	0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D_t D_{treat}$ 的系数在 4 个回归中分别为 2 412.74、2 355.66、1.08 和 1.07,且显著。 $D_t D_{treat} D_{rg}$ 的系数在 4 个回归中分别为-2 343.75、-2 278.70、-1.06 和-1.07,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回归 1 与回归 2 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人均收入,回归 3 与回归 4 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人均收入的对数。 $D_t D_{treat} D_{rg}$ 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互助资金促进了农户收入增加。 $D_t D_{treat} D_{rg}$ 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富人治村不利于互助资金促进农户收入的增加,也即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有负面影响。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1。

(二) 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表 2 结果是否稳健,笔者以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村贫困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做了稳健性检验。笔者以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D_t D_{treat} D_{rg}$ 的系数为正且分别在 10%或者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富人治村对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减少有负面影响。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1。

表 2 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影响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农户人均纯收入		被解释变量: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对数	
	(1)	(2)	(3)	(4)
D_{treat}	-920.55 ** (360.50)	-921.21 ** (359.28)	-0.66 *** (0.14)	-0.64 *** (0.15)
D_t	1803.31 *** (152.88)	1743.15 *** (152.69)	0.62 * (0.35)	0.63 * (0.36)
$D_{treat} D_t$	2412.74 *** (576.80)	2355.66 *** (574.51)	1.08 * (0.61)	1.06 ** (0.53)
$D_t D_{treat} D_{rg}$	-2343.75 *** (570.02)	-2278.70 *** (567.87)	-1.06 *** (0.20)	-1.07 *** (0.20)
$D_{treat} D_{rg}$	-709.13 (491.30)	-717.14 (489.45)	-0.59 *** (0.19)	-0.6 *** (0.17)
$D_{rg} D_{rg}$	-112.90 (345.90)	-111.09 (344.49)	-0.05 (0.13)	-0.02 (0.14)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_cons$	2796.79 *** (141.63)	2845.04 *** (431.70)	7.78 *** (0.16)	7.77 *** (0.15)
N	2632	2632	2520	2520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3 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影响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贫困深度的对数		被解释变量:贫困发生率的对数	
	(1)	(2)	(3)	(4)
D_{treat}	-0.73 ** (0.29)	-0.72 ** (0.27)	-0.34 (0.31)	-0.32 (0.31)
D_t	-0.37 ** (0.17)	-0.30 (0.20)	-0.09 (0.14)	0.05 (0.17)
$D_{treat} D_t$	-1.07 ** (0.41)	-1.02 ** (0.42)	-0.72 ** (0.32)	-0.66 ** (0.33)
$D_t D_{treat} D_{rg}$	0.88 ** (0.39)	0.82 ** (0.40)	0.53 * (0.32)	0.48 * (0.27)
$D_{treat} D_{rg}$	0.41 (0.32)	0.42 (0.31)	-0.09 (0.35)	-0.07 (0.35)
$D_{rg} D_{rg}$	-0.13 (0.22)	-0.14 (0.25)	-0.17 (0.20)	-0.19 (0.22)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_cons$	36.18 *** (6.21)	32.54 *** (7.50)	3.41 *** (0.22)	3.29 *** (0.27)
N	100	100	100	100

五、机制分析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验证研究假说2,进一步考察富人治村影响扶贫项目减贫效应的内在机制。笔者首先分析富人治村对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影响,然后分析富人治村对扶贫项目精英俘获的影响。

(一) 富人治村对建档立卡瞄准的影响

参考 Panda^[10]和胡联等^[19]的研究,笔者设定模型(2)分析农户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影响因素。

$$Probit(cd=1)=G(a+\beta_1D_e+\beta_2D_eD_{rg}+\gamma X)$$
(2)

其中 $cd=1$ 表示农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反之为 0; D_e 表示农户是否是精英农户的虚拟变量,若农户为精英农户则取值为 1,反之为 0。本文对精英农户的定义:如果一个农户本人或者家庭成员是乡村(或以上)干部或者该农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本村的最富裕农户(收入 5 等分分组中最高的),为精英农户。 X 为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是 D_eD_{rg} 的系数 β_2 。它度量了富人治村对贫困村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影响。

表 4 富人治村对建档立卡精英俘获影响的估计结果

	(1)	(2)	(3)	(4)
D_e	0.03 (0.05)	0.12 (0.17)	0.12 (0.16)	0.12 (0.16)
D_{rg}	0.23 *** (0.07)	0.26 *** (0.08)	0.27 *** (0.08)	0.26 *** (0.08)
D_eD_{rg}	0.15 * (0.08)	0.16 * (0.09)	0.15 ** (0.07)	0.69 * (0.38)
pop		0.04 * (0.02)	0.04 * (0.02)	0.03 (0.03)
$hedu$			-0.00 (0.01)	-0.00 (0.01)
$sick$			0.01 (0.03)	0.01 (0.03)
$d02$				0.00 * (0.00)
$b03$				0.11 (0.13)
$amyear$				0.01 (0.01)
$_cons$	0.02 (0.06)	0.21 * (0.11)	0.24 * (0.13)	0.09 (0.22)
$Wald\ chi2$	20.56	24.70	25.01	26.21
$Log\ likelihood$	-897.44	-895.35	-895.2	-892.17
正确预测百分比	66.13%	65.37%	55.90%	66.30%
N	1313	1313	1313	1313

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D_eD_{rg} 的系数为正且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且其数值均大于其对应 D_e 的系数值,这说明富人治村的情况下,精英农户更易成为建档立卡户。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2。这说明,富人治村会导致贫困村的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率增加。一些精英农户通过和富人村干部的联系能够成为建档立卡户。

(二) 富人治村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

参考 Panda^[10]和 Pan^[9]的研究,笔者设定模型(3)分析农户参与扶贫项目的影响因素。

$$Probit(use=1)=G(a+\beta_1D_e+\beta_2D_eD_{rg}+\gamma X)$$
(3)

其中 $use=1$ 表示使用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农户,反之为 0; D_e 表示农户是否是精英农户的虚拟变量,若农户为精英农户则取值为 1,反之为 0; X 为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是 D_eD_{rg} 的系数 β_2 ,它度量了富人治村对扶贫项目精英俘获的影响。

表 5 富人治村对扶贫项目精英俘获影响的估计结果

	(1)	(2)	(3)	(4)
D_e	0.02 (0.13)	0.99 * (0.56)	0.97 * (0.56)	0.99 * (0.54)
D_{rg}	-0.26 (0.25)	-0.49 (0.32)	-0.48 (0.32)	-0.23 (0.33)
$D_e D_{rg}$		1.06 * (0.57)	1.02 * (0.57)	1.06 * (0.56)
pop		-0.14 *** (0.03)	-0.14 *** (0.03)	-0.09 ** (0.04)
$j18$		0.17 (0.17)	0.17 (0.17)	0.18 (0.17)
$hedu$			0.01 (0.01)	0.01 (0.01)
$sick$			0.04 (0.05)	0.06 (0.05)
$d02$				-0.07 *** (0.02)
$b03$				-0.59 *** (0.22)
$amyear$				-0.05 ** (0.02)
$_{cons}$	-0.32 (0.24)	0.45 (0.33)	0.33 (0.35)	0.98 ** (0.45)
$Wald\ chi2$	1.24	22.38	23.35	55.39
$Log\ likelihood$	-423.28	-412.01	-411.4	-379.46
正确预测百分比	71.29%	71.43%	71.43%	72.26%
N	780	780	780	780

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D_e D_{rg}$ 的系数为正且在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富人治村的情况下,精英农户更易参与扶贫项目。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2。这说明,富人治村会导致贫困村的扶贫项目精英俘获率增加。一些精英农户通过和富人村干部的联系能够参与扶贫项目。无论是建档立卡还是扶贫项目的实施,富人治村都会带来精英俘获。

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有负面影响的内在机理在于:富人治村会带来建档立卡和扶贫项目的精英俘获。笔者认为富人治村导致精英俘获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从富人当村干部的动机来看,存在精英俘获的主观可能。富人当村干部的动机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单纯想为乡村发展做贡献。这类富人村干部抱着一颗公心,一心为带领群众致富。二是希望通过当村干部提高自己社会地位。这类富人村干部借助当村干部扩大自己在村子内的人际交往,认识政府层面的领导干部,扩大人脉圈子,提高自己社会地位。三是希望通过当村干部来谋取更大的利益。这类富人村干部希望通过当村干部进一步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利于影响到政府决策,最终将这些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笔者认为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富人村干部,存在将公共(扶贫)资源私人化运用的可能,也即精英俘获的可能。

第二,富人村干部缺乏有效的监督,存在精英俘获的客观条件。富人村干部当村干部之前本来就由于其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乡村精英,富人当村干部之后其经济、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大。没有外部的有效制约,富人村干部并不会因为自身经济富裕放弃对可能到手的公共资源的“俘获”。富人治村使得经济资源与

政治资源高度重叠,更容易发出为了自己或者利益相关者谋取公共(扶贫)资源。而我国农村中村民代表大会、全体村民大会等机制很难对村干部形成有效制约。富人村干部存在精英俘获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一些地方富人治村的效果较好,更多是部分富人村干部道德自觉的衍生品。但如果缺乏完善的乡村治理,富人治村会带来精英俘获。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实证结果显示富人治村不利于贫困村贫困减少;第二,富人治村不利于农村减贫的内在机理为富人治村会导致建档立卡和扶贫项目的精英俘获,进而影响扶贫项目的减贫效应。第三,如果村级治理完善,富人治村可发挥其正面作用,有利于农村减少贫困;但如果村级治理不完善,富人治村可发挥其负面作用,不利于农村减少贫困。

综上,富人治村有其发展经济的优势,但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富人治村也会带来公共(扶贫)资源精英俘获的问题,这反而对农村减贫不利。富人治村实质上是基层精英政治的延续和表现。没有良好的村级治理,缺乏村民有效的监督,表面看上去能有致富示范作用的富人村干部带来的是扶贫项目的精英俘获和治理领域的“囚徒困境”。要避免“富人治村”负效应的产生,就需要调整国家资源输入方式和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研究结论对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完善有启示意义,第一,需加强对富人村干部的严格选拔。富人村干部有其发展经济方面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公共权力私人化运用的可能。所以对选拔富人村干部须在品德上严格把关。第二,村庄运行要增加监事制度,加强乡村治理机制体制改革,完善乡村治理。加强对富人村干部的培养和引导,使其成为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富有建设性的力量。第三,我国农村地区可以逐步推行村民议事会制度。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分离,村委会不直接介入管理,重大决策更多的是由村民议事会来决策,村委会更多的是管一些社会服务工作。第四,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上保证富人治村成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卢福营.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J]. 学术月刊, 2011, 43(10): 23-29.

[2] 贺雪峰. 论富人治村——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J]. 社会科学研究, 2011(2): 111-119.

[3] 贺雪峰, 谭林丽. 内生性利益密集农村地区的治理——以东南 H 镇调查为例[J]. 政治学研究, 2015(3): 67-79.

[4] 贺雪峰. 富人治村与双带工程——以浙江 F 市农村调查为例[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1, 13(3): 70-77.

[5] 贺雪峰. 治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6] 刘锐. 富人治村的逻辑与后果[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90-98.

[7] GALASSO A, RAVALLION M. Decentralized targeting of an antipoverty program[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4): 705-727.

[8] BESLEY T, PANDE R, RAO V. Just rewards? Local politics and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outh India[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2, 26(2): 191-216.

[9] PAN L, CHRISTIAENSEN L. Who is vouching for the input voucher? Decentralized targeting and elite capture in Tanzan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2, 40(8): 1619-1633.

[10] PANDA S.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lite capture in a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in India[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51(50): 50-65.

[11] 仇叶.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基层民主实践机制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1): 52-66.

[12] 韩鹏云. 富人治村的内在逻辑与建设方向[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8): 77-83.

[13] 欧阳静.富人治村——机制与绩效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1(5):197-202.

[14] 袁松.富人治村——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1996—2011)[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15] 陈柏峰.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6(9):4-12.

[16] 王谦,王秋苏.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减贫效应研究[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29(5):36-45.

[17] LAFFONT J J, TIROLE J.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 theory of regulatory captur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4): 1089-1127.

[18] BOURDIEU P.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M]. Oxford: Polity Press, 1996.

[19] 温铁军,张俊娜,邱建生.居安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20] 胡联,汪三贵.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挑战吗[J].管理世界,2017(1):89-98.

[21] 张宗新,杨万成.声誉模式抑或信息模式:中国证券分析师如何影响市场?[J].经济研究,2016,51(9):104-117.

[22] 简泽,张涛,伏玉林.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4(8):120-132.

[23] BAI Y, JIA R.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J]. Econometrica, 2016, 84(2): 677-733.

[24] 汪三贵,陈虹妃,杨龙.村级互助金的贫困瞄准机制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1(9):47-53.

Does Village Management by the Rich Help to Reduc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HU Lian¹, LU Yang², SHEN Pengcheng², WANG Sangui³

(1.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00, China; 3. Schoo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Village management by the rich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mode of rural management, and controversies about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have been existing in theoretical circl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 implementation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it is of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whether village management by the rich is conducive to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Our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urvey data shows that village management by the rich is not conducive to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and that village management by the rich can lead to the capture of elites in archiving, licensing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thus affecting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If the village-level management is perfect, village management by the rich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and is conducive to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but on the contrary, it is not conducive to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rich village cadres, establish the supervisory system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villages, gradually implement and perfect villagers' council system, improve rural management, and guide the rich village cadres to become a constructive force for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implementing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village management by the rich;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elite capture; village-level management

(责任编辑 赵 甜)